



大家文存
经验评论丛书

梁 启 超 集

付祥喜 陈淑婷 编

梁 启 超

SPM

南方出版社
广东人



大家文存
粤港评论丛书

梁启超集

付祥喜 陈淑婷 编

本项目受广东省宣传文化发展专项资金资助出版

SPM

南方出版传媒
广东人民出版社

·广州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梁启超集 / 付祥喜, 陈淑婷编. — 广州: 广东人民出版社, 2018.1

(粤派评论丛书)

ISBN 978-7-218-12255-7

I. ①梁… II. ①付… ②陈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现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6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72958号

LIANG QICHAO JI

梁启超集

付祥喜 陈淑婷 编

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出版人: 肖风华

责任编辑: 李黎 古海阳

装帧设计: 张绮华

排版: 广州市奔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技编: 周杰 易志华

出版发行: 广东人民出版社

地址: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(邮政编码: 510102)

电话: (020) 83798714(总编室)

传真: (020) 83780199

网址: <http://www.gdpph.com>

印刷: 珠海市鹏腾宇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张: 17.25 字数: 235千

版次: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8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(020-83795749)联系调换。

售书热线: (020) 83795240

“粤派评论丛书”编辑委员会

(按姓氏音序排列)

学术顾问：陈思和 温儒敏

总 主 编：蒋述卓

执行主编：陈剑晖 郭小东 贺仲明 林 岗 宋剑华

编 委：陈剑晖 陈平原 陈桥生 陈小奇 古远清

郭小东 贺仲明 洪子诚 黄树森 黄天骥

黄伟宗 黄修己 黄子平 蒋述卓 林 岗

刘斯奋 饶芃子 宋剑华 谢有顺 徐南铁

许钦松 杨 义 张 柠

总 序

近百年来中国文坛，“京派批评”“海派批评”以及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“闽派批评”已是大家公认的文学现象，但“粤派评论”却极少被人提起。事实上，不论从地域精神、文化气质，还是文脉的历史传承，抑或批评的影响力来看，“粤派评论”都有着独特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，有它的优势和辉煌。只不过，由于历史、现实、文化和地域的诸多原因，“粤派评论”一直被低估、忽视乃至遮蔽。有鉴于此，我们认为，以百年粤派文学以及美术、音乐、戏剧、影视等评论为切入点，出版一套“粤派评论丛书”，挖掘被历史和某种文化偏见所遮蔽的“粤派评论”的价值，彰显粤派文学与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深厚底蕴，不仅能更好地展示广东文艺评论的力量，让“粤派评论”发出更响亮的声音，而且有助于增强广东文化的自信，提升广东文化的影响力，促进区域文化的繁荣发展。

出版这套丛书，有厚实、充分的历史、现实、文化和地域等方面的依据。

第一，传统文化的影响。岭南文化明显不同于北方文化。如汉代以降以陈钦、陈元为代表的“经学”注释，便明显不同于北方“经学”的严密深邃与繁复，呈现出轻灵简易的特点，并因此被称为“简易之学”。六祖惠能则为佛学禅宗注进了日常化、世俗化的内涵。明代大儒陈白沙主张“学贵知疑”，强调独立思考，提倡较为自由开放的学风，逐渐形成一个有粤派特点的哲学学派。这种不同于北方的文化传统，势必对“粤派评论”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。

第二，文论传统的依据。“粤派评论”的起源可追溯到晚清，黄遵宪的“诗界革命”，梁启超的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倡导，开创了一个时代的风潮，在

全国产生了普泛的影响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，黄药眠在《创造周报》发表大量文艺大众化、诗歌民族化的文章，风行一时。钟敬文措意于民间文学，被视为中国民间文学的创始人。新中国建立后的“十七年”，“粤派评论”的代表人物有黄秋耘、萧殷、梁宗岱等人。新时期以来，“粤派评论”也涌现出不少在全国具有一定知名度的文艺评论家。如饶芃子、黄树森、黄修己、黄伟宗、洪子诚、刘斯奋、杨义、温儒敏、谢望新、李钟声、古远清、蒋述卓、陈平原、程文超、林岗、陈剑晖、郭小东、宋剑华、陈志红等，其阵容和影响力虽不及“京派批评”和“海派批评”，但其深厚力量堪比“闽派批评”，超越国内大多数地域的文艺评论阵营。如果视野和范围再开放拓展，加上饶宗颐、王起、黄天骥等老一辈学者的纯学术研究，则“粤派评论”更是蔚为壮观。

第三，地理环境的优势。从地理上看，广东占有沿海之利，在沟通世界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；同时，广东处于边缘，这既是劣势也是优势。近现代以来，粤派学者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，感受并接受多种文明带来的思想启迪。他们视野开阔，思维活跃，不安现状，积极进取，敢为人先，因此能走在时代变革的前列。黄遵宪、康有为、梁启超、孙中山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。他们秉承中国学术的传统，又开创了“粤派评论”的先河。这种地缘、文化土壤的内在培植作用，在“粤派评论”的发展过程中是显而易见的。

“粤派评论”有属于自己的鲜明特点。

第一，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，是“粤派评论”最为鲜亮的一道风景线。在这方面，“粤派评论”几乎占了文学史写作的半壁江山，而且处于前沿位置，有的甚至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高地。比如20世纪80年代，钱理群、陈平原、黄子平联合发表的著名论文《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》，其中陈平原、黄子平均为粤人。洪子诚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》以方法先进、富于问题意识、善于整合中西传统资源和吸纳同时代前沿研究成果著称，它与陈思和的《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》被学界誉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“南北双壁”。杨义的三卷本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是比较方法运用在文学史写作的有效实践，该著材料扎实，眼光独到，分析文本有血有肉，堪与夏志清的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比肩。此外，温儒敏的《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》、黄修己的《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》、古远清的港台文学史写作，也都各具特色，体现出自己的史观、史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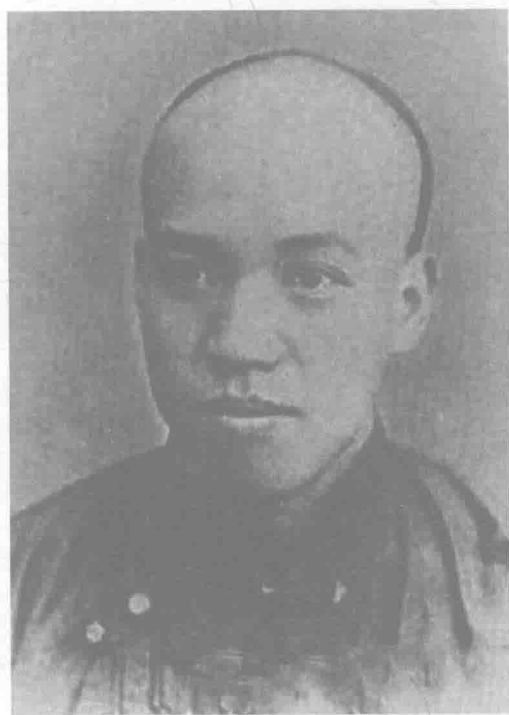
和史德。

第二，“粤派评论”注重文艺、文化评论的日常化、本土经验和实践性。粤派评论家追求发现创新，但不拒绝深刻宽厚；追求实证内敛，而不喜凌空高蹈；追求灵动圆融，而厌恶哗众取宠。这就体现了前瞻视野与务实批评的结合，经济文化与文艺批评的合流，全球眼光与岭南乡土文化挖掘的齐头并进，灵活敏锐与学问学理的相得益彰，多元开放与独立文化人格的互为表里。粤派评论家有自己的批评立场、批评观念，亦有自己的学术立足点和生长点。他们既面向时代和生活，感受文艺风潮的脉动，又高度重视审美中的文化积累和文化遗产；既追求批评的理论性、学理性和体系建构，又强调批评的实践性，注重感性与诗性的个性呈现。

我们认为，建构“粤派评论”，不能沿袭传统的流派范畴与标准，它不是一种具有特定文化立场、一致追求趋向和自觉结社的理论阐释行动。它只是一个松散的、没有理论宣言与主张的群体。因此，没有必要纠结“粤派评论”究竟是一个学派，还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“粤派评论”已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实体，即虽具有地方身份标识，却不局限于一地之见的文艺理论家、批评家群体。

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，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，坚守中华文化立场，立足当代中国现实，结合当今时代条件，发展面向现代化、面向世界、面向未来的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。广东省委宣传部策划、组织、指导编纂出版“粤派评论丛书”，是贯彻落实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发展精神的一项重要举措，是讲好中国故事、传播中国声音、阐发中国精神、展现中国风貌的一次文化实践。我们坚信，扎根广东、辐射全国的“粤派评论”必将成为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路上其中一块最稳固的基石。

“粤派评论丛书”编辑委员会



梁启超像

编者简介：

付祥喜，广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。主持并完成多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。在《中国社会科学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文艺研究》等刊物发表多篇学术论文。出版有《20世纪前期中国文学史写作编年研究》《新月派考论》等著作。

陈淑婷，广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。

出版前言

陈淑婷

梁启超（1873年2月23日—1929年1月19日），字卓如，一字任甫，号任公，又号饮冰室主人、饮冰子、哀时客、中国之新民、自由斋主人。广东新会人。清朝光绪年间举人，中国近代思想家、政治家、教育家、史学家、文学家。戊戌变法（百日维新）领袖之一，中国近代维新派、新法家代表人物。

梁启超是晚清戊戌变法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，也是晚清思想启蒙思潮的倡导者和掌舵者，他对晚清思想界的影响巨大，学界普遍将其参与的戊戌变法及之后的思想启蒙视为“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”，并且这场思想启蒙运动直接对“五四”时期新文学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。梁启超除了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学家，对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良有一番大作为之外，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文学家。他开创的“新文体”及相关理论主张，代表着当时“文界革命”的基本方向，革新了当时以桐城派统治的文坛；他开展的以政治小说为核心的“小说界革命”为“小说”正名，让“小说”与诗词文等正统诸文类并列；他所提倡的以“新诗体”为中心的“诗界革命”刷新了晚清诗坛。

戊戌变法前，梁启超师从康有为，并与之创办维新派报刊《万国公报》（后更名《中外纪闻》），并与“新体诗”先驱黄遵宪以及谭嗣同、夏曾佑等人一同发起诗歌改良运动，后与诸多仁人志士一同发动公车上书以及维新变法，但在中外联合剿杀之下，变法失败，梁启超亦被迫流亡日本。在日本流亡期间，深受日本维新政治与学术氛围影响的梁启超，先后创办《清议报》《新

民丛报》《新小说》等报刊，并先后在所办报刊中特辟专栏，刊登黄遵宪、谭嗣同等人的“新派诗”，同时，他亦自撰《饮冰室诗话》，对康有为、黄遵宪、谭嗣同等人的新派诗作做摘录，并发表相关评论。其中，《清议报》主要是其政论文与倡“新文体”的主阵地，《新民丛报》则是宣扬其资产阶级改良政治主张的主要阵地，而《新小说》是中国最早的专载小说的期刊。梁启超旅居日本期间，偶读友人所赠的日本政治小说《佳人奇遇》，产生了小说也可以传达政治主张的想法，遂在《新小说》创刊号上发表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，提出以“小说革命”为中心的“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”的言论，强调小说的政治功能、开发民智的功能，对中国近代小说观念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，规模及影响之大，都是同时进行的“文界革命”与“诗界革命”所不能企及的。

影响晚清启蒙者的两股思潮，分别是达尔文的“进化论”与卢梭的“民约论”。在阐释社会政治体制革命及文学革命时，梁启超也曾援引由严复引进与翻译的《天演论》中的观点：“新民子曰：革也者，天演界中不可逃避之公例也。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，不适于外境界者灭，一存一灭之间，学者谓之淘汰。淘汰复有二种：曰‘天然淘汰’，曰‘人事淘汰’”。他所倡导的“革命”是欧、日等国温和的“革命”，而非中国“汤武革命”般的“王朝变革”式的暴力“革命”。所以，所有他所倡导的任何内容的革命，都是以“改良”的形式进行的。

梁启超于1899年12月在赴夏威夷的途中首次提出“文界革命”的口号，他在《夏威夷游记》中真实记录了关于“文界革命”的初步构想，并由此正式拉开了“文学之革命”的帷幕：

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，其文雄放隽快，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，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，余甚爱之。中国若有文界革命，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。



而且，在提出“文界革命”的构想之前，梁启超已撰文要求打破桐城派的晦涩繁复的古文藩篱，让作文从桐城派所提倡的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的文辞中得到革新，推行平易畅达的“新文体”。“新文体”的主张发端于1896年梁启超创办《时务报》时，在刊登过的相关“时务文”中皆有体现，但“新文体”从形成至成熟再到衰退是一个可观的过程，及至1899年甫提“文界革命”，“新文体”理论的趋于成熟可以看作是梁启超关于“文界革命”的具体实践。在《清代学术概论》中梁启超曾如此评价自己所提倡的“新文体”：

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，幼年为文，学晚汉魏晋，颇尚矜炼，至是自解放，务为平易畅达，时杂以俚语韵语以及外国语法，纵笔所至不检束，学者竞效之，号新文体。老辈则痛恨，诋为野狐。然其文条理明晰，笔锋常带感情，对于读者，别有一番魔力焉。

以上这段话正是梁启超对他所提倡的新体散文特征的鞭辟入里的、高度的概括，即平易畅达、条理明晰、笔锋带情、文白夹杂以及巧引外国语法等。他运用这种“新文体”理论，创作出一系列新式政治散文。其中，按梁启超在《〈清议报〉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》一文中所述，他认为《过渡时代论》《呵旁观者文》以及《少年中国说》等文章是“开文章之新体，激民气之暗潮”的“新文体”文章。

晚清时期的散文，基本上秉承以方苞、刘大槐等人为首的桐城派所讲究的“义法”，“程朱”思想厚重，力求“清真雅正”，但随着时代与思想的发展，“凡物适于外境界者存，不适于外境界者灭”，“文以载道”与“八股”式作文体制僵滞，旧式文学的最后一座堡垒的桐城派，作文风格逐渐与时代脱节，思想先进的文人早已务求改变文界停滞不前的窘况，经由龚自珍、魏源等人“今文经学”的主张，再到康有为、谭嗣同等人政治色彩浓厚的论文，再到梁启超创作的已成一派理论、初具“新文体”系统规模的政论散文，散文的创作从桐城派的桎梏中解放出来。

例如《少年中国说》的行文特点就与其所说的“平易畅达”相契合，文章文言与白话相杂，引用俚语与舶来语，浅近流畅，通俗易懂。试摘录《少年

中国说》片段以供鉴赏：

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，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

“新文体”尽管是“文界革命”的产物与成果，但实际上“新文体”的概念一直贯穿在梁启超所发动的“诗界革命”“戏曲改良”以及“小说界革命”等文学改良运动之中。

在《夏威夷游记》中，梁启超也提出了“诗界革命”的构想，批判当时为复古诗风所统治的诗坛，肯定黄遵宪等人的“吾手写吾口”的新诗风格，并提倡“新意境”“新语句”“旧风格”三位一体的新诗概念：

……欲为诗界之哥仑布、玛赛郎，不可不备三长。第一，要新意境。第二，要新语句。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，然后成为其诗……若三者具备，则可以为二十世纪支那之诗王矣。

他自谦“余虽不能诗，然尝好论诗”，十分推崇康有为、黄遵宪、严复、夏曾佑、谭嗣同等人的“新诗”。在“诗界革命”构想的初期，梁启超更多地关注向西方借鉴与学习的问题，故而他在《小说丛话》中论辩道：

彼西人之诗不一体，吾侪译其名词，则皆曰诗而已，若吾中国之骚、之乐、之词、之曲，皆诗属也，而寻常不名曰诗，于是乎诗之技乃有所限。

在《饮冰室诗话》中，梁启超摘录黄遵宪等人的诗，并加以中肯赞赏的评论。其中，他多次赞赏黄遵宪等人的诗感情铿锵，深受感动。在黄遵宪等人倡导新体诗之前，晚清的诗坛是以陈衍为首的“同光体”、王闿运为首的“汉魏六朝诗派”以及樊增祥为首的“中晚唐诗派”等以拟古复古主义为主的诗派



所统治。他们作诗以“无一处不用典”“无一处没有来处”为特点，诗歌显得老腐而没有新意，难以感受到作者的真实感情，更与梁启超等人所一直倡导的文学社会功用的观点更是南辕北辙。在《〈晚清两大家〉题辞》中指出：

其实就以中国旧诗而论，那几位大家所走的路，并没有错。其一是专玩味天然之美……其二是专描写社会现状……中国最好的诗，大都不出这两途。还要把自己的真性情表现在里头，就算不朽之作。

“诗界革命”冲击了长时间统治晚清诗坛的拟古复古主义诗派，新体诗的语言趋于通俗，不受旧制束缚，不同程度地解放了诗歌的表现力。

二

“小说革命”的主张无疑是梁启超学术生涯中最重要一环，也是学界研究梁启超文论最广的范畴。

1902年11月，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为小说正名的报刊——《新小说》，并在创刊号刊登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一文中认为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，是为“民智不开”所致，而“小说”是开民智最有力的武器，并首次提出“小说界革命”的口号，正式拉开“小说革命”的帷幕：

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以下新一国之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世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、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何以故？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。

梁启超受严复与夏曾佑所撰的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的影响与启发，到日本后，又偶获友人所赠的日本政治小说，这些都促使其小说改良构想的形成。1903年以笔谈的形式刊登在《新小说》的《小说丛话》是梁启超对其“小说界革命”主张的继续探讨与理论的补充，同时他强烈表达了当时以“出版说

明”的形式登载在《国闻报》上的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对他的“震撼”：

天津《国闻报》初出时有一雄文，曰《本馆附印说部缘起》，殆万余言，实成于几道与别士二人之手。余当时狂爱之，后竟不克哀集。惟记其中有两大段，谓人类之公性情，一曰英雄，二曰男女，故一切小说，不能脱离此二性。

早在1897年写成的《变法通议·论幼学》，梁启超就从言文合一的角度来阐述小说的重要性。“古人文字与语言合，今人文字与语言离”，在他看来，言文合一的核心是用俗语、俚语，即“……而《水浒》《三国》《红楼》之类，读者反多于六经。……今宜专用俚语，广著群书。上之可以借阐圣教，下之可以杂述史事；近之可以激发国耻，远之可以旁及夷情……”。除了阐述应用俗语与俚语的重要性之外，他还强调小说应该跳出本土的圈制，以西方小说作为参照物来评价小说的政治与社会功用，吸收外来文化来丰翼中国小说，同时强调翻译与创作政治小说在“开民智”上的重要性。提倡“政治小说”的翻译与传播是梁启超开启“小说界革命”的标志。政治小说即“昔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理想也。其立论以中国为主，事实全由于幻想”。东渡后他在《清议报》上开辟“政治小说”专栏，连载《佳人奇遇》《经国美谈》等政治小说，在这一期间发表的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中，他认为“政治小说之体，自泰西人始也”，并在《自由书》一文中，以日本明治维新来论证小说“浸润于国民脑质”的政治功能。及至1902年的《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，梁启超旗帜鲜明地将小说定位于“文学”的领域内，同时也强调了“新小说”是“新民”的必要手段，同时也是实现其政治改革的重要手段：

今日欲改良群治，必自小说界革命始；欲新民，必自新小说始。

梁启超除了致力于推进小说的社会功用的宣传、倡导译印政治小说之外，还参与到翻译外文小说和创作政治小说之中，不仅连载翻译《佳人奇遇》



《经国美谈》等政治小说，也创作了国内第一部政治小说《新中国未来记》。在《新中国未来记》的绪言中，他一如既往地强调政治小说的重要性：

顾确信此类之书，于中国前途，大有裨助，夙夜志此不衰。

梁启超同时也将戏剧的改良纳入到“小说界革命”的范畴之中，这也是他将小说地位继续提高的意图之一。他亲自撰写了《劫灰梦传奇》与《新罗马传奇》等戏剧作品，并在《新罗马传奇》的楔子中说道：

念及立国之根本，在振民精神，因此著了几部小说传奇，佐以许多诗词歌曲，庶几市街传诵，妇孺知闻，将来民气渐伸，或国耻可雪。

梁启超的传奇体戏剧，内容之新，思想之新，除了一定程度上为他的“小说界革命”作出贡献，但同时对改良中国戏剧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。

三

梁启超所提倡的“文界革命”“诗界革命”和“小说界革命”的三大文学改良运动几乎囊括了当时整个文学界的方方面面，是“群氓时代”的启蒙。从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的晚清启蒙思潮是近代启蒙思潮的发端，它直接对“五四”启蒙思潮起着引玉之效。

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实际上让文学经历了一个“俗化”的过程，将文学从繁复难涩中解放出来，成为一个大众化且能启蒙民智的工具。在“文界革命”等三界革命的提倡尚未提出之前，文学界就已经对散文、诗歌等僵滞而不得新意的创作方式不满，零零碎碎的想法不断从文学界的各个角落里冒出来，但始终得不到一个统一的“口径”。严复、康有为等人之后的梁启超以一锤定音之势，阐释并提出改革口号，联合康有为、黄遵宪等学界前辈发动“文界革命”等文学改良运动，革新散文与诗歌的创作手法，并将小说从文学的附庸中

解放出来，让其成为主流文学体裁。

时代造就英雄，梁启超生存于内患未息、外患迭起的乱世，为改变落后的现状而进行政治改良的强烈的政治抱负，反映到他的文学改良中也毫不逊色。但由于当时严峻的政治环境、西方先进思想受众群较小等因素，梁启超的文学改良运动虽轰轰烈烈，但又像昙花一现般地快速退潮。然而，虽然维持时间较短，但对后世的影响，尤其是对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启发是不可估量的。

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是近代中国继晚清以来第二次大型思想启蒙运动，其中“反传统、反孔教、反文言”的“新文化”主张与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理论一脉相承。由于梁启超为小说的发展扫清了障碍，“五四”期间，小说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文坛上，而且借梁启超“言文合一”与“诗界革命”的东风，胡适、刘半农等人的白话诗也有了“底气”与梅光迪等人进行一番辩论。

综上，作为近代中国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文学家，梁启超可谓百科全书式的人物，他一生的著述规模庞大，涉及面广，无论是社科论文、政论文，还是文学作品，都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对政治、文化等层面革新的渴望与希冀，都是学界中不可缺少的瑰宝。作为广东人，梁启超是近代以来广东引以为豪的文化巨匠，他留下的文学评论方面的文字，是亟待重新整理的瑰宝。鉴于此，把梁启超列入粤籍评论家、整理出版梁启超评论文集，应当是很有意义的。所选文章，大多出自《饮冰室合集》（中华书局1989年版），凡是涉及文学评论者，均尽量予以收入，但难免有遗珠之憾，望方家指正，待将来修订。

2017年6月